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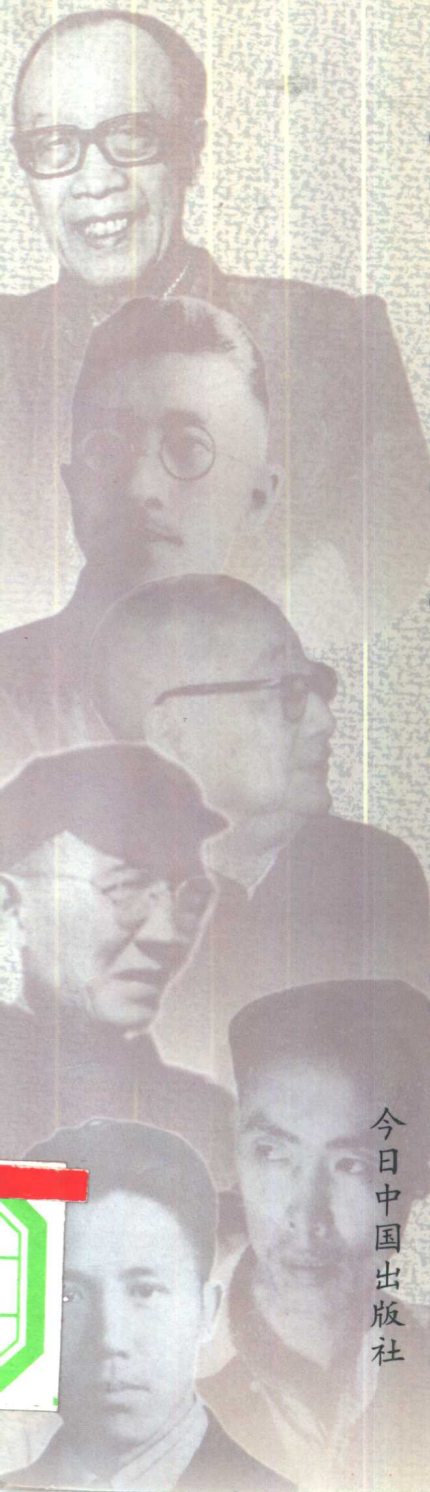
上卷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课题组编

恩怨录

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

今日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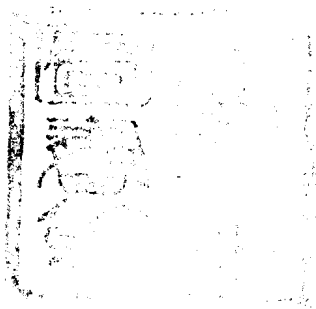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3 1008 0

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

上 卷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课题组编

主编 李富根 刘 洪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北京

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

下 卷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课题组编

主编 李富根 刘 洪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北京

〈京〉新登字第 132 号

责任编辑:高 唐

装帧设计:李法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李富根,刘洪主编. —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12

ISBN 7-5072-0869-9

I. 恩… II. ①李…②刘…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010 号

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

李富根 刘洪 主编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6 字数:89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072-0869-9/C·22

定价:(上、下册)42.00 元

出版说明

一.鲁迅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他的论敌,或曰论争对手(其中不乏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进行“论战”的文字。这些文字是鲁迅文笔最为犀利、最为精采的那一部分,它们特别鲜明地表现出鲁迅的性格特点,历来为鲁迅研究者注重。自鲁迅逝世后,至今60年来,已有很多著名的研究成果,然,偏重于鲁迅一方,其论敌之文章,几乎被岁月的尘埃湮没殆尽。本书编辑之发端,乃因了鲁迅在《“题未定”草》之八中的一段话:“……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芒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故尔,编者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反复搜寻“对面的文章”,与鲁迅的文章编排一起,遂成此书。

二.本书的编辑原则为“有来有往”,即将鲁迅与他的论敌的文章按双方的“往来”辑录一起,有批评,则有回应,有发难,则有反驳,形成一个个论战的“回合”。编者力图使论争双方的文字对照显明,让读者分明地感到论战文章的“有的放矢”和阅读的趣味。

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了解鲁迅与之论敌论战的来龙去脉,编者采用将事件和人物相对集中,同时关照文章发表之时间顺序(以鲁迅文章发表的时间为基准)的编辑体例,将全书文章分为38次94回合。所谓“次”,就是围绕某个大的问题或针对某个具体的对象

5/92/2
07

所展开的一次论战,这种论战短则一个回合,长则十数回合;而所谓“回合”,则如前所述,是双方“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一回文字交锋。

论战双方有来无往、没有形成回合的文章,原则不收,但少量十分精采和说明问题的,以附录形式,录于每“次”之后。

三.辑录的文章,以杂文为主,鲜有书信,不收小说、散文;循“有来有往”的原则,故鲁迅逝世后别人的批评攻击文字,一律不收。另,鲁迅为文的风格,常在一篇文章涉及论敌多人,编者择其主要者加以对照编排以避免重复,并非“挂一漏万”;实不能避免重复者,正文略,存目。

四.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当年论战的原始形态,是本书编辑的又一重要原则。为保证“原汁原味”,本书辑录的文章全部以第一次发表时的文字为蓝本,除个别明显的别字衍字予以订正外,其余全部保持文章最初发表的原样,包括一些当时的习惯用词、用句和译名;但署名例外,一律用原名,发表时所用的笔名,连同发表年月日及刊物,附于文章后标明。

五.本书中,鲁迅之文章相对其论敌的文章而言,数量略少,这是因为鲁迅的文章较易查阅,“对面的文章”则因查阅不易而弥足珍贵。

六.综合诸多鲁迅研究专门家的意见,为使全书脉络更为清晰,编者为每一“次”论争均加了简短说明,以介绍论争的历史背景及发生的原因,同时给每一“次”论争拟了一个大标题,每一“回合”拟了一个小标题,这种做法,除使读者方便阅读外,别无他意。

七.值此全书案头工作完成之际,特鸣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博物馆、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月刊的专家和学者们对于本书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编者

序 一

王得后

鲁迅在纪念朋友的时候，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这是伤心然而却悟道的人生经。也适用于他自己的身后是非的。

我原以为“谬托知己，舐皮论骨”的“无聊之徒”，都是见过鲁迅，或虽憾无一面，失之交臂，却心仪已久，甚至是同一营垒的战友，才有称道的资格。后来才知道，这是太“少不更事”，简直没有用心去读鲁迅的话。就是当年的论敌，也可以大写回忆文字，解释那些针锋相对的白纸黑字，其实乃一点误会；他的心，还是和鲁迅相通的。就是鲁迅死后才出世的人，也可以著书立说，说是唯有他才与鲁迅“神交”，把握着鲁迅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是的，“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原来这涉及一系列关于历史的问题。

历史是什么东西？历史是人的言行的实录，人与人关系的陈迹，人的已经凝固的生活，或生活的化石。已然是入土的文物了。如果这不算大错，那么，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就靠实证，靠发掘，靠考据，靠持之有故的理论分析了。然而，“人生盖棺论定”的话是有的；还有诗：“人生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但盖棺论定的事却几希。不但一个人，而且是咱们的始皇帝，盖棺两千多年了，还在争

论不休，莫衷一是；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党，一次伟大的革命，有了“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之后，不到二十年，又重新写过了。“不泯是人心”么？不，还是鲁迅说得对：“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何况，人类就是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呀！

这就来了第二个问题了：历史是什么人写的？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不错，二十四史大抵是这样的。

有人说，历史是后死者写的，不错，大抵不错，虽然自己活着写自传，写历史的也不少，但后死者总还要再写下去的，或照样写，或接着写，或重新写。

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大有含冤不白，哭诉无门的味道了。可惜的是，这前提：“什么是人民？”先就是一个莫大的问号。

这是真的，尽管人生并不这样称心如意：“车到山前必有路”；人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总是在看来没有路的地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披荆斩棘，走出一条条路来的，历史总有人写下去。

这些年，中国的文界，不知吃了什么“棒喝”，睡梦中翻了一个身似乎醒来了似的，又齐声大喊鲁迅过激了，“全面反传统”自然反错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不对了，“锋芒太露”了，“剑拔弩张”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大概觉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吧，光读鲁迅的论争文字不行，不读“围剿集”的论争文字也不行，还是一一对照，两面文字都读的好，于是不怕辛苦，不怕烦难，从难以寻觅而又发黄的故纸堆里，比照着鲁迅的论争文字收集、整理、编辑出另一面的大作，集印在一起，成就为这一本书。我以为不但好，而且实在是功德无量。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虽然我知道，读文章，归根结底，还是因人而异；同一个人也还会因时而异，有了这本便于人们比较的书，也不能救度人间一切受骗的人。

于是第三个问题出来了：历史有什么用？

我们中国人是相信历史有莫大的功用的，太史公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就在为了完成《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格言，就连唐太宗，也高唱“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可是不但唐亡了，唐以后接二连三，亡了多少朝代呵！覆车之鬼，绵绵不绝，倒是人间的真实。历史的教训又像是一无用处了。有人说，人类是不会接受历史教训的，也许这种看法比“前车之鉴”更深刻？

不过，也还是因人而异的，不是又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人么？

这些都无关宏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书必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岂止有益于鲁迅研究？

96.8.18

王得后：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序 二

王富仁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真是繁荣昌盛，它教会了中国人怎样说话。“说话”成了一门艺术，会说话的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能说出很得体的话来，既让对方感到很舒服，又使自己不吃亏。当然，有时候也不免发发脾气，抖抖威风，摆摆架子，瞪瞪眼睛，但那是对“手下人”，据说对他们严厉一些，是爱护他们，他们假若听了不高兴，那是他们不识好歹。到了他对“外人”也发脾气的时候，那是他已忍无可忍，值得同情的当然也是他，假若那个“外人”是个“有身份的人”，你也不要为他担心，仔细打听一下，你便会知道，那个人最近出了件倒霉的事，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威风”了。这些人的说话艺术越来越高，另一些人就无话可说了。“话”都叫他们说完了，“理”都叫他们占尽了，“便宜”都叫他们占光了，别人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久而久之，也就不会说话了。“是，老爷！”“你说得对，少爷！”“我这就去办，小姐！”“是我的错，小的愿挨打受罚！”“青天大老爷，千万给小人我做主哇！”他们一生只要学会说这几句话，就保管能用一辈子。不会说话的人遇到不会说话的人，那可只有吵架的份了。三句话没说完，就祖宗三代地骂起来，但他们是一些没有身份的人，因而吵架也是不文明的行为，是为我们的文化所不齿的。他们是不会说话的人，但却是会“听话”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艺术，那就是“听话”的艺术。“老爷今天不高兴，你这不是找着去挨骂吗？”“听话听音，老爷的意思你还听不出来吗？”“说话”说出了艺术、“听话”也听出了艺术，“艺术”是可以供人欣赏

的,于是也就有了看热闹的。看热闹的人既是欣赏家,也是评论家。“看人家多会说话,一句话就把那个小子的嘴堵住了!”“他怎么这样说呢?老爷就怕提起这件事,他真是哪把壶漏提哪把!”看热闹的人看长了,也就看成了艺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到看热闹看出了门道,那就成了“评论家”了,所以他们的艺术是“评论”的艺术。“评论家”自然会看门道,也就容易挑出会说话人的毛病,他难免不在背后说些那些会说话的阔人老爷的坏话。到叫会说话的老爷抓住了把柄,他们可就吃不了的兜着走了。在这时,不会说话的“底下人”帮不了他们的忙,也不愿意帮他们的忙,因为他们向来是听话听惯了的。但是,这些评论家也自有自己的经验,他们是不会把话说得那么明白的,是不会指名道姓地指着那些体面人的脸说那些不好听的话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那就是“幽默”。不伤和气,又能说出点实情,这就更要有点聪明劲,所以别人称他们为“才子”,但是,“才子”也不是轻易能当的。别人都不“幽默”,只有他们“幽默”,大人老爷们一眼就把他们的“幽默”看个底穿:“他妈的,他个臭小子敢幽我的默!”于是他们就免不了被传唤到大人老爷们的“府”上,受到大人老爷们的叱骂。到这时候,他们只有改口说:“老爷,你别误会,那,我可不是说的你呀!我骂的是某某那个龟孙子!”“老爷,我那可是为了你好哇!人心不可违,你要不听我的劝告,你的江山可就坐不稳了!”“你看,我不是也骂了你的敌人吗?”凭他这点说话的技巧,有时也能叫大人老爷们放他们一码,而万一倒了霉,他们也觉得死得风流,总不像那些不会说话的笨人,窝窝囊囊地生,窝窝囊囊地死。有说的,有听的,有评点的,这个世界就热闹了起来,但也有一些不喜欢“闹”的人,他们也说话,但只是自己给自己说话。他们的艺术,是自言自语的艺术。到了晚上,抬头往天上一看:“哇,今天月亮好圆啊!”到了春天,到后花园里逛一逛:“啊,春天的花好美呀!”秋风吹来了,他们心里的那点寂寞变得难耐起来:“噫吁嘻,秋风好萧瑟吆!”在这时,他们觉得自己和“天”都“合一”了,与“天”是“合一”了,但与“人”呢?还是

“合”不起来。见了人，他们还是无话可说，大家互相拱一拱袖子，点一点头：“今天天气，哈哈！”你顾了我的面子，我顾了你的面子，伤不了和气，就成了他们最高的人生境界。除了自言自语的艺术之外，他们还得练就一门对人的艺术，那就是“面子”的艺术。

中国文化越发展，中国人就越会说话；中国人越会说话，中国的文化越发展。发展出好多好多的“史”，好多好多的“集”。后来蒙古人来了，吓了中国人一大跳，但后来才发现，蒙古人整个地一个傻冒儿，连句话也不会说。中国人走上前去，低头一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于是中国人很看不起他们；后来，满族人又来了，又吓了中国人一大跳。就好像中国人已经摆好了一桌席，满族人进来，二话不说，往首席上一坐就吃了起来。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他们拳大胳膊粗，不叫他们吃是不行的。开始时颇有些愤愤然，但后来满族人居然和中国人说起话来，并且学会了中国人的说话方法，并且比中国人自己说得还好。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可喜滋滋的：“嘻嘻，他们叫我们同化了！”经了这两次事变，中国人就更会说话了，中国的文化就更繁荣、更昌盛了。又有了好几部“史”、又有了好多好多“集”。中国人满以为，天底下只有中国人会说话，只要这样说下去，准会说到“平”了“天下”。

但是，“洋鬼子”又打来了！

不幸的是，鲁迅就生在这“洋鬼子”打来的时候。好多中国人都说，中国人的话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了；再这样说下去，就把中国这个“国”说“亡”了。鲁迅当时还年轻，就把这话当了真。原本来，鲁迅是学过中国人怎么说话的，要是他能老老实实照古人教给他的说话方式说下去，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落拓一生，说不定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叫中国的文人羡慕得流口水，并且尽管心里悻悻然，嘴上是不敢说什么的。后来有人称他为“世故老人”，就是因为他太懂得中国人应当怎样说话了。可惜他打错了主意，他想把中国人中那些只听不说的人的话说出口来，为中国找到另外一种说话

的方式。这一下，可就捅了中国人的马蜂窝。那些会说话的大人老爷们从他的话里听出了大逆不道，自然是窝着一肚子火，就是那些向来只能听不能说的“听话”的人们，也觉得他特别可恶，因为他破坏了他们与大人老爷们的那种稳定的、“和谐”的上下级关系；那些聪明的才子们，向来是自视很高的，他们不允许也不相信还有比他们说话说得更好的人，这里有一个“文坛地位”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忘不了时时表示一下对鲁迅的瞧不起。至于那些向来习惯了自言自语的艺术家，既不满于鲁迅把中国说话的秩序搞得这么乱，也不满于他那种不顾面子的直白直道。可怕的是，他太懂得中国人的“世故”了，中国古代人的那点小聪明，那点小心眼儿，瞒不过他的眼睛去。过去没有人“说破”，自然是彼此笑嘻嘻的，现在一经“说破”，人人就都受不了了。鲁迅的错处，在于他不知道现代的中国人还是需要把彼此的感情蒙在温情脉脉的那层语言的帷幕之后的。他以为大家都说新文化了，就一定是不怕说出实情的了，事事都要寻个真理儿出来了。其实不然，新文化要是给不了中国人面子，中国人要新文化做什么呢？人死了，不要紧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呢？只要我们给他个什么称号、给他个“面子”就行了；国亡了，也不要紧的，你总不能把这个责任让哪一个人负吧？再说，偌大一个中国，谁都吞不下去的。发展得快不快，思想自由不自由，那都是次要的事情，你能过，我就能过，落到孔乙己、阿Q那个份上的，到底只有少数几个人，再说，他们也不是“文坛”上的人，谁能管得了这么多？但“面子”，每人都有一个，触到了谁的，谁都不高兴。于是，鲁迅就掉到中国文化的陷阱里了。你使大家没了“面子”，大家还能让你有“面子”？鲁迅好骂人了，鲁迅多疑了，鲁迅不甘寂寞了，鲁迅好嫉妒了，鲁迅强词夺理了，鲁迅心理变态了，鲁迅是汉奸了，鲁迅好大喜功了，鲁迅上了共产党的当了，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背后的那点又神秘又令人解恨的影影绰绰的事儿了，鲁迅什么什么了，什么什么了，都出来了。自然鲁迅是这么一个人，当然他的话也就……。据说，这都是研究的需要，绝没有贬低鲁迅的意思，

但是，一般人还是知道，要不是鲁迅太好惹是生非，一向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还是不会提他这些事的，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你就好好想想吧！你有没有鲁迅的那种不怕骂的劲头呢？要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地闭上你的鸟嘴吧！多数的中国人一想，自己确确实实是不如鲁迅经得起骂的，于是“鲁迅杂文”的时代就过去了，大家又渐渐恢复了中国人自己正常的说话方式，天下也就平静了许多。鲁迅，当然成了名人，大家都说他很伟大，但比较起来，当然还是我们的古圣先贤更有远见，更正确，他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缺乏全面的认识。

在生前，鲁迅就想编一本《围剿集》，言下之意大概想说，大家都说我好骂人，但谁又知道，别人是怎样对待我的呢？但后来终究没有编。现在今日中国出版社觉得还是编出来让大家看看最好，我想也是，说到目的，我想，出版社也无非是想出一本读者有可能买的书，我们几个搞过鲁迅研究的人，无非是想，在“做”鲁迅研究的时候，有这本书可能更方便一些。至于别的目的，是没有的。读者看了，会产生什么效果，我想，大概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王富仁：中国首位获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序 三

钱理群

这本书很容易被看作是一本“骂人文选”：别人如何“骂”鲁迅，鲁迅怎样回击；鲁迅如何“骂”人，别人怎样回应，等等。其实，“骂”是可以区分的：“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的这句名言是人们所熟知的；鲁迅指的是不讲道理，只一味“鼓噪”、骂娘、诬陷、造谣，甚至动不动要人“死”之类的卑劣行为，并以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遗产，是应为现代的作者竭力抛弃的。至于那些想借权势的“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的论者，鲁迅更是轻蔑地称之为“乏走狗”——这里顺便说一句，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文章这些年来一直受到尖锐的批评，并被很多人拿来作为鲁迅“局限性”（“偏激”呀，“粗暴”呀，“不宽容”呀，等等）的“有力”证据；其实，只要看看十数年文坛的风风雨雨，有那么一些人总要想借助政治权力来打倒自己的论敌，便可知道，鲁迅对这类社会（思想）典型的概括仍然具有生命力，是绝非一句“局限性”就能抹杀的。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如鲁迅所说，“所谓捧和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的字眼”；而在鲁迅看来，真正的文人是“不随和”、不回避的，他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而且“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即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今天重温鲁迅的这些言论，再看看他的那些“喜笑怒骂”的文章，是不能不感慨系之的。这些年人们

经常提倡“宽容”，这是经历了“人人斗，天天斗”的斗争岁月（到今年正好是30年）以后，很容易产生的心理需求，而且对于任何恢复那个时代盛行的“辱骂与恐吓”（不管用什么名义）的企图，都应该继续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把“宽容”变成无是非，无好恶，处处掩饰自己的情感（态度），抹杀一切棱角，即失去了文人的真追求，真性情，那就是天大的误解，知识者的大悲哀。我在两鬓斑白的今天，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最感不安与不满、以至痛苦的，就是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夹着尾巴过日子”，而且至今仍不能摆脱许多不应有的束缚。因此，当我在读鲁迅的这些“骂人”文章时，总想起鲁迅的那句话：“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我因此而深受感动，并且心向往之——虽始终不能至。

但我们有些人却要批判鲁迅的“好骂人”。不是说鲁迅不能批评（事实上从鲁迅出现在文坛上那一天起，对他的“骂”就没有停止过），但在批评之前却先要理解，至少先要弄清楚，鲁迅在什么情况下，为何要“骂人”，他骂的是什么人，怎样骂，他的理由（逻辑）是什么，骂的结果如何，对方以及社会（学界、文界）如何反应，等等，不理解（弄明白）这些，只笼统批评鲁迅“好骂人”，就会给人一种隔膜之感。而这些年这样的隔膜实在是太多了。鲁迅生前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这一点。他在离世之前所写的《“题未定”草》之八里，就提到倘若只留下论战中某一方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芒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他因此建议要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文集”，以为这是“留给后人的宝贝”。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年就去世了，人们尽管把他抬得很高，却无人顾及他生前的这一愿望。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大概是四十年来第一本按照鲁迅的意愿编成的同时收录论战（相骂）双方文章的文集。有了这样的“对比”，或许可以弄清楚原先单看一面

的文章难以明白的许多事情。比如,人们会发现,原来鲁迅之被骂远多于他之骂人,在许多问题上他都是出于被动的反击;鲁迅对别人多是“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他自己却是一再地被人指为“拿卢布津贴”的“学匪”,宣布要“实际解决”的,等等。人们还会发现,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指责鲁迅“武断”地“糟蹋”、“冤枉”了“中国书”;那么,近年(本世纪末)有人将鲁迅视为所谓“文化断裂”的罪魁祸首,不过是旧话重提,“老谱袭用”而已。近年来学术界与非学术界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高论,其实只要放在事实面前一对照,就会不攻自破。鲁迅曾说到“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那么,本书大概也是可以起到“防受骗”的作用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下功夫认真地通读鲁迅的全部原著。

1996年8月26日写于燕北园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